第一章思考题：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使中国结束了以往任何革命都没法完成的两半社会，使中国获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详述之艰难与挫折。

段泽慧：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840年以后，内忧外患交集在一起，中国人民受到了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中国革命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在农村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和政权，并把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共和国。革命事实最终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我党深入基层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大革命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大革命农民运动失败后，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关于军事问题，他谈的最深刻：“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

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都面临三个共性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其中核心内容是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古田会议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终于成功开辟出来了。

1930年9月中旬，攻打长沙失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率前委机关30人、警卫连130人，从长沙白田铺出发，傍晚到达株洲。毛泽东、古柏驻扎在港口街一竹器店、朱德、彭德怀驻扎在恒和药号和志新昌布店。毛泽东等当晚在中正街（现解放街）“协丰长“绸布店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做出“撤回江西、进攻吉安”的正确决策，扭转了中国革命又一次严重危机。此为共产党第一次确立放弃攻打城市，优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6%96%B0%E9%98%B6%E6%AE%B5"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6%9D%91%E5%8C%85%E5%9B%B4%E5%9F%8E%E5%B8%82/_blank)》、《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理论著作，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特点和主要形式，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

林冬亮：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艰难与挫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大量共产党人，是血的教训。政权须由枪管子里出，于是有了南昌起义，但仅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城市起义是远远不足以成燎原之势。关键时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良好建设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道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伟大转变，要摒弃教条，具体结合国情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还要抵挡反围剿，后被迫长征，仍坚持这一道路，这一道路终于在抗日时期熠熠生辉，各阶级联合抗寇，解放建国，再转为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这条道路是党的智慧结晶。

刁微微：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闯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标志，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和理论。

方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践的开始，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起初，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中心城市的，但后来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失败。失败后的部队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的农村区域，农村地区反动阶级力量薄弱，且有广大劳苦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有良好的群众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反动派力量强大是不可能自动将政权交出来的，并且千方百计想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国广大劳苦人民想要真正做到当家作主，就必须用武力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一个彻底的斗争手段，就比须成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途径。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对象指向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农村应当成为工作重心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的建设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必然的，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有强权，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要从农村到城市。第三，反革命势力控制了城市与交通要道，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也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是可能的，是因为：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间隙。第二，建立根据地的在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马国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的，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依靠广大农民与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结束了国家的两半社会，使中国获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

艰难与挫折：包括国民党右翼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际共产主义，尤其是苏共对中国革命的过度干预与机械指挥，不符合中国的革命形势，使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初期损失惨重；帝国主义的威胁与压迫等。

林佳漫：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艰难与挫折：①、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广州、海陆丰、湘东、湘南、黄安等地的工农群众在武装起义中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先后被优势的反动势力摧残了。这小块地区的红色政权仍处在强大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仍不断地遭到优势敌军的“围剿”。

②、党内许多同志从指导思想上是反对农村武装割据的。

党内右倾悲观论的责难、怀疑；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冲击、批评。

③、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的提案被否决。

④、秋收起义的失败。

⑤、党的六大后，从1928年到1930年间的中央一些重要文件不仅否定了“割据”的提法，而且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是“农民意识”，“忘记了城市的领导作用”，是“右倾”的“躲避主义的游击战争方式”，“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⑥、党的骨干力量由灯红酒绿的城市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农村，有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对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发生了动摇。

廖雨欣：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它是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只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而且，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是，中共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且统治力量强大。中共在中心城市的革命力量较为弱小，要在城市同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武装决战是非常困难的。但广大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环节，而且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来说，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以说农民就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武装农民，这就为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只有在农村积蓄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

这条道路的实践经历了很多曲折。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从八七会议到1928年间，中共在各地发动百余场武装起义，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均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但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初期，“农村割据”只是作为实施武装暴动方针的一个过渡环节，即工农武装暴动后先通过“割据”有一个立足点，然后攻打城市，而不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换句话说，这种“割据”是从属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总战略的。而且，当时共产党内许多人从指导思想上是反对农村武装割据的。比如瞿秋白就在党的六大说过：“海陆丰胜利之后，就发生了‘割据’这个名词，我是反对这个名词的（只能说是建立革命区域）。”党的六大后，从1928年到1930年间的中央一些重要文件不仅否定了“割据”的提法，而且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是“农民意识”，“忘记了城市的领导作用”，是“右倾”的“躲避主义的游击战争方式”，“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等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他们始终坚持“工农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最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林蓉：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了一条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

①国民大革命失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最终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

②党内左倾错误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铸造辉煌的时候也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和挫折。没有多久，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好革命局面，被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所破坏。根据地愈来愈缩小，直至最后被断送。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的对立和冲突的集中表现。这种对立和冲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后算起，至少有这样几次：

一是在1931年11月初瑞金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领导受到指责，“左”倾错误领导将毛泽东逐渐排挤出重要领导岗位。此后，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同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斗争，中央苏区才得以继续发展，红军继续壮大。

二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左”倾错误领导不顾周恩来等的反对，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决定将毛泽东调回后方。

三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到瑞金，“左”倾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2月，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打成“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接着，又在江西苏区开展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坚持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这期间，毛泽东在离开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专门从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在苏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时，苏区人民为了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和红色政权，踊跃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反“围剿”战争。但是，由于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扭转中央苏区日益困难的局面。

四是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中央主要领导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这时，蒋介石正统率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异常紧张。六届五中全会却错误地认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从1933年10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直接指挥下，历时一年之久，不仅没有能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中央苏区的绝大部分县都先后丢失，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这块红色土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极其艰苦的长征。

③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可歌可泣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红军长征历时两年零五天。各路红军长征总里程约为六万五千余里（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7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④抗日战争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年平均牵制日本陆军的74％以上，最高年份达90％。

⑤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取代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在中国采取去了扶蒋反共的政策。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

刘唐娟：经过1924-1927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把革命方向道路问题严重地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能否尽快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能否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实践的重点，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毛泽东革命的立足点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并且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 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工为条件，互为依托的。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 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9年以后，又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还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和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仅仅是标志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并没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郭昊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闯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标志，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和理论。

林倩：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艰难困苦：

1.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人民大众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收到挤压。

2、东北易帜：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时代结束，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 。无产阶级的势力受到打击。

3、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才找到革命的前进方向，这是大革命失败到土地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

4、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领导，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创建人民军队，拥有属于人民自己无产阶级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还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5、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为以后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提出打下基础。其首次使用工农革命军旗帜和名号，同时还吸收数量众多的工农群众。

6、三次“左”倾错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盲动主义错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都使得共产党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出现极大失误，带来极大挫折，但是同时也坚定了毛泽东以农村为中心走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提出助力。

刘泽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

第一阶段,1927年大革命与秋收起义失败，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的提出，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基本形成期,即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为标志;第三阶段,成熟发展时期,以一九三六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战争和战略》和一九三九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主要标志。